

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1976—1989

刘略昌

(上海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1976年至1989年是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起步阶段。总的看来,这一时期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呈现如下特点:研究范式从阶级论转向审美分析;以普及宣传为目的综述新西兰文学;毛利文学研究横空出世;同步追踪新西兰当代文学;曼斯菲尔德译评热潮。虽然研究成果绝对数量不算太多,但从纵向发展看,1976至1989年间新西兰译评构成了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史上重要的一环。

关键词:新西兰文学;文学研究;曼斯菲尔德

中图分类号:I61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5-0153-06

一、引言

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23年徐志摩《哀曼殊斐儿》^①的发表。此后,陈西滢、沈雁冰、凌淑华等人也纷纷在报刊上或翻译或评介曼斯菲尔德,由此掀起了译介曼斯菲尔德和新西兰文学的一股小小热潮。建国之后,由于政治原因,新西兰文学在国内的传播步入了几近于无的沉潜期。随着1976年文革结束,新西兰文学译介和研究重新起步。1990年以来,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1976年至1989年的十多年时间在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历程中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正处于过渡阶段,另一方面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学科起步和历史过渡的交融在这一时期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二、研究概况

根据中国知网、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检索信息,1976年至1989年国内共出版新西兰文学译著8部^②,推出大洋洲文学丛书9部,各类期刊杂志发表新西兰文学译文35篇、论文32篇。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研究,由此才真正起步。既然是蹒跚起步,那么此时的新西兰文学研究必然会面临诸多第一次:1980年,《世界文学》第5期刊登莫·夏波特著、张禹九译《房间》和乔·考雷著、余德予译《丝绸》,这是文革结束之后国内期刊杂志上登载有关新西兰文学最早的译文;1981年,《长江文艺》第9期刊登杨江柱《捕捉瞬间的印象——曼斯菲尔德和印象派》,这是新时期以来国内以新西兰文学为题的第一篇期刊论文;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宝心、王嘉龄、李自修三人合译的《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曼斯菲尔德小说集。

收稿日期:2011-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9&ZD071)子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略昌(1978-),男,山东潍坊人,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语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

①徐志摩《哀曼殊斐儿》,《努力周报》1923年第44期。

②这一数字不包含台湾1988年出版的《纽澳短篇小说精选》(刘祥光、张凤珠、郑荣珍译,台北:国神出版社)。

20世纪80年代,国内翻译新西兰文学的主要译者有文洁若、任荣珍、萧乾和陈家宁四人。文洁若与荔子合作翻译了曼斯菲尔德小说集《蜜月》^③,另撰有论文1篇、译文8篇,其中1篇译文为与萧乾合译;任荣珍发表论文5篇、译文1篇^④;萧乾发表3篇论文和1篇译文;陈家宁发表译文3篇。仅从译者的角度加以考察,会发现此时译者身份与解放前新西兰文学译介者身份有所不同。1949年前,翻译新西兰文学的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和冰心等人多为作家型翻译家。而1980年之后,除了萧乾和文洁若

仍属于作家型翻译家之外,任荣珍、陈家宁以及下文将会提到的安徽大学评介者多属于学者型翻译家。如此观之,作家型翻译家的逐步退场和学者型翻译家的陆续登台是此后中国新西兰文学译介趋势。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刊登有关新西兰文学方面论文、译文的主要刊物,包括《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8篇)、《外国文学》(7篇)、《外国文艺》(5篇)、《译林》(3篇)。四大刊物在此期间登载与新西兰文学有关的论文、译文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 四大刊物上登载的新西兰文学相关论文、译文情况

刊物名称	篇数	刊载日期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8	译文:1987年第4期、1989年第4期 论文:1987年第4期(2篇)、1989年第4期(4篇)
外国文学	7	译文:1981年第12期、1982年第11期、1988年第5期、1989年第4期 论文:1987年第9期、1988年第5期(2篇)
外国文艺	5	译文:1986年第3期
译林	3	译文:1988年第1期 论文:1988年第1期、1989年第4期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此期间《外国文学》对新西兰文学的追踪最为持久,该刊物在1981年、1982年、1987年、1988年和1989年都曾发表新西兰文学方面的译文或论文。《外国文艺》虽然刊登了5篇新西兰短篇小说译文,但均集中在1986年第3期。80年代后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译林》杂志开始涉足新西兰文学译评,其中前者译评力度更大,仅在1989年第4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就刊登了1篇译文和4篇论文。

1976年至1989年间,国内还涌现出一个致力于新西兰文学研究的学术团队——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79年,将大洋洲国家与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区域,进行全面系统的文学研究,研究范围涵盖了新西兰文学、澳大利亚文学以及南太平洋岛国文学。经过多年积累,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现已成为国内公认的大洋洲文学和文化研究基地。

在教学和研究之余,大洋洲文学研究所从1981年开始编辑出版大洋洲文学丛书,开始大规模翻译新西兰小说、诗歌、传说和民间故事,并登载一定数量的介绍性或研究性论文。20世纪80年代出自安徽大学的大洋洲文学丛书共有9本,它们在栏目设置中均为新西兰文学译评留下了不少篇幅。这套丛书包括:《自由树上的狐蝠》(1981年)、《街上的面容》(1981年)、《安着木腿的人》(1982年)、《烟草》(1982年)、《拘留所里的图书馆》(1983年)、《大洋

洲民间故事集》(1983年)、《盛宴前后》(1984年)、《古老的植物湾》(1984年)和《病骑手》(1985年)。

前面提到的任荣珍就是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成员,除了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涉及新西兰文学的译文、论文,她还在大洋洲文学丛书中留下了不少文字。在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起步期,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曾做的这些译介工作,为国内其他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并有力推动了国内新西兰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三、研究特点

此时国内新西兰文学研究处于真正意义上的起步阶段。既然处在起步阶段,那么此时的新西兰文学研究必然以介绍普及为主,这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数不少的小说、译文的出现为此提供了极好注释,毕竟译本才是国人了解进而研究新西兰文学的主要渠道。另外,这一时期还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研究者思想的转变也在此时新西兰文学研究成果中打上了深深烙印。总的看来,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89年,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呈现如下特点。

(一)从阶级论到审美分析的范式转变

研究者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国文学研究者自身的思想变化比外在环境的变化更为重要。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由于历史复杂性,外国文学研究者短时间内尚未完全摆脱长期以来的思想桎梏^⑤,正常、活跃的学术气氛形

③曼斯菲尔德《蜜月》,文洁若、荔子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年。

④这个数字不包括任荣珍在大洋洲文学丛书中发表的大量译文和论文。

⑤钱中文曾经指出:“解放后的文学研究方法,不同于解放前的,原因在于解放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我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加上五十年代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就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钱中文《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更新的方法》,《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运用这种独具特色的方法研究外国文学,的确曾经取得过重大研究成果,但这种方法也显得有些单一,因而难以对复杂的文学现象做出科学概括。

成和研究范式转换都需要时间缓冲。对此时新西兰文学研究而言,1985年基本上成了一道分水岭:1985年或1985年之前的文章在剖析新西兰作家或某部作品艺术成就时,行文中仍多少残留一些用僵化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的痕迹。而1985年之后的论文基本上割掉了这条小辫子,行文更加注重作家艺术成就和作品艺术性。

方平是中国著名翻译家,他在1983年写了一篇题为《笔端蕴秀,如见其人——谈曼斯菲尔德的写作艺术》的文章。在分析《莫斯小姐的镜子》时,方平指出:“女作家巧妙地用镜外人和镜中人的‘对话’去发掘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看她那种可叹又可笑的顾影自怜,你就想象得到,在这个冷酷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她内心深处包藏着多么可怕的孤独感”^{[1] 340}。如此的阶级批判意识不止存在于这一处。在提到《金丝雀》时,方平也不忘朝阶级观点靠拢:“通过一只小小的金丝雀,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它后面的人间悲剧。在那个冷酷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最丰富的人的感情,只能畸形发展和人和小动物间的相依为命”^{[1] 343}。方平还认为,曼斯菲尔德固然善于揭示人的不幸,但却拙于揭露那造成人间不幸的社会。不过,方平在评价《洋娃娃的房子》时指出,女作家终于“在这里有了突破,难能可贵地接触到了这样一个生活真理:不合理的阶级社会是造成人间不幸的根源。无论是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上来说,《洋娃娃的房子》无疑是属于曼斯菲尔德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1] 346}。从今天的角度看,《洋娃娃的房子》固然写得不错,但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曼斯菲尔德最优秀的作品。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新西兰文学研究中,方平的研究极具典型性,这是时代影响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留下的影子。由此也可以看出经过长期的思想禁锢和持续的政治运动之后,知识分子要做到彻底的思想解放是何等艰难。方平的研究尚且如此,其他的新西兰文学研究者就更是如此了。董璐蓓在分析《侍女的一生》时说道:“女作家成功地描写了这些细节,让我们见到资本主义文明的悲剧——无望的孤独感和摆脱不了的精神重负”^[2]。钟林在探讨了曼斯菲尔德《游园会》的艺术手法后,也“画龙点睛”地指出:“《游园会》是部好作品,但也存在着不少缺陷。由于作者的视野受到世界观的限制,因而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社会性方面写得不够充分。小说中劳动人民的形象显得苍白无力,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社会的不公正,只有在另一个世界里才能找到安慰和宁静”^[3]。

(二)普及宣传烛照下的文学综述

由于当时新西兰文学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对读者来说新西兰文学还是比较陌生的领域,所以宣传普及比深度研究工作更迫切,这也符合历史逻辑和学术发展必然规律。

虞建华探讨了新西兰民族文学形成原因,认为

民族文学的产生过程实际上是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在新西兰,“则是‘新西兰人’的概念萌发、巩固及其在文学中反映和表达的过程”^[4]。民族文学形成过程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巨变。经过研究,虞建华发现“文学领域中‘英国绅士’和‘新西兰人’在三十年代终于形成对峙”^[4],在此之前的文学只能算作殖民时期文学。殖民时期文学“以浪漫主义的‘英国梦’为精神支柱”,实际上“只不过是英国文学在海外的延续”^[4]。而1929年经济大萧条使新西兰人的“英国梦”幻灭,这“把文学推进了现实主义的民族文学轨道,完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4]。

任荣珍简要介绍了1860至1890年间的新西兰小说。在任荣珍看来,这时的新西兰文学尚处于草创时期,虽然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重要作品,但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以内容来看,新西兰早期小说可分毛利小说、拓居小说和淘金小说这三大类^[5]。为让国内读者更好地了解新西兰短篇小说最新动向,任荣珍还翻译介绍了一篇题为《正在变化的趋势——谈新西兰短篇小说》的文章。该文认为,短篇小说历来是新西兰最优秀作家的文学创作方式,“在二十世纪的新西兰文学作品中,短篇小说及其流行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占有主导地位”^⑥。新西兰当代短篇小说正在进行一场革命,但“其传统也不断得到发扬”^⑥。涂开益也对新西兰文学发展历程作了概述。

(三)横空出世的毛利文学研究

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89年,国内的新西兰文学研究还开辟了一个新领地,即涉足毛利文学研究。在这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应属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任荣珍和马祖毅两人。

1987年,任荣珍撰写了《毛利口头文学》一文。该文声称,毛利口头文学在新西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内容广博,其中既有散文,也有诗歌。毛利口头文学尽管在艺术上没有多高价值,但在社会学上却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因为它对研究毛利原始部落历史堪称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史料^[6]。一年之后,任荣珍又发表了《新西兰毛利口头文学》,对毛利口头文学进一步阐述。任文宣称,毛利口头文学源自毛利人世世代代的劳动生活,这些文学与毛利部落社会生活大体上相适应。任荣珍把毛利口头文学分为神话、传说和诗歌三类。任荣珍指出,毛利人的神话基本上以波利尼西亚人的神话为基础,但在新的环境中有所更改和发展。毛利传说则不同于毛利神话,它从地理上来说完全是新西兰的,一般叙述人类可能发生的事。与毛利神话和传说相比,毛利口头诗歌的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可以说贯穿于有史以来的毛利部落生活^[7]。

毛利口头文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对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毛利作家群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

^⑥任荣珍《新西兰短篇小说的动向》,《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7期。

70年代以来,新西兰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用英语写作的优秀毛利作家。有论者甚至宣称,由于毛利作家的涌现,20世纪70年代“成了当代文学最令人振奋的时期。在此期间,新西兰文学在形式、内容和方向上,都产生了前二三十年所无法预见的巨变”^[8]。任荣珍对新西兰当代毛利作家的创作也给予了一定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崭露头角的毛利作家中,任荣珍认为,最为突出的当属霍恩·图法里、威蒂·伊希玛埃拉、帕特里夏·格雷斯和凯里·休姆。他们甚至成了当今新西兰文坛的中坚^⑦。在主题思想上,当代毛利作家也呈现共同趋势,“这些毛利作家始终坚持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扎根于毛利人的生活之中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他们的作品大多截取毛利人的各个生活画面,从不同角度叙述了毛利人的本土生活、社会地位及与白人的矛盾冲突,反映了他们的希望和幻灭、欢愉和痛苦”^⑧。

在《大洋洲诗话》和《大洋洲诗话(续)》这两篇文章中,马祖毅均留有一定篇幅谈及毛利文学。在《大洋洲诗话》中,马祖毅提到了毛利诗人阿皮拉纳·塔伊罗尔的诗作《雷神》^[9]。马祖毅还从图法里的诗集《狗年》中,选译了《献给牧人儿子的歌》和《哈伊库》。马祖毅声称,图法里“赋予自然现象以人性的这一显著特点,乃是植根于信仰灵魂学说的毛利人对世界的看法”^[10]。

(四)当代文学动态的同步追踪

从1976年文革结束至1989年,新西兰当代文学得到了国内译评者的极大青睐。1980年第5期《世界文学》刊登了新西兰当代作家乔·考雷(Joe Cowley, 1936—)《丝绸》和莫·夏波特(Maurice Shadbolt, 1932—2004)《房间》,后者最初曾发表于1962年9月出版的《新西兰季刊》,后又收入1963年出版的《夏季的火焰与冬季的乡野》。1986年第3期《外国文艺》也刊登了五位新西兰作家的小说^⑨,译文之前的导言声称:“这些作家在当代文坛上都享有一定声誉,在国际上也日渐受到注意”^⑩。在此时期,对新西兰当代文学介绍最多的还是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丛书。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大洋洲文学丛书登载的新西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一个老人讲的故事》选自1978年再版的《萨吉森短篇小说集》,《喜鹊》选自1979年出版的《二十世纪新西兰诗歌选集》,《猫头鹰在哀鸣》选自1971年出版的《企鹅图书文学指南丛书·英国及英联邦国家文学》,《过饱之症》选自1979年出版的《要通过的地方》,《桔子和柠檬》选自1979年第3期《陆地》,《琼斯太太》选自1972年出版的《绿岩,绿岩》,《鸽群》选自1977年出版的《新西兰听众短篇小说选》,《小故事:献给F.S》选自1977年

出版的《新西兰听众短篇小说选》,《媳妇》选自1978年第127期《陆地》季刊,《自然过程》选自1978年第127期《陆地》,《龙落子和礁石》选自1977年第1期《玛纳》,《诗二章》选自1977年第122期《陆地》,《家务事》选自1978年第127期《陆地》,《我的姐妹们》选自1979年第130期《陆地》。

除了翻译新西兰当代文学作品,大洋洲文学丛书还刊登了新西兰学者撰写的几篇宏观论述新西兰当代文学的文章。在《送往迎来:八十年代的新西兰小说》中,彼得·辛普森指出:虽然近年来有价值的长篇小说寥若晨星,但短篇小说却多如牛毛。在过去的40年中,新西兰短篇小说主要继承了萨吉森的传统。但当代的短篇小说作家却向“追求现实主义形式和口语化的语言”、“突出个人贬低团体”的文学传统发起挑战。其中一群反叛者师法曼斯菲尔德,“倾向于含蓄地描写现实”^[11]。一群青年作家“为了跟上海外小说近年来的发展步子”,正在“试图修改,甚至摒弃偏狭的现实主义观念”^[11]。辛普森还勾勒了20世纪80年代新西兰诗坛概况,认为新西兰诗歌创作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从来没有今天这般繁荣过”^[12]。这时期的新西兰诗歌创作健康活泼,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个形势是空前的,令人鼓舞的。”^[12]20世纪80年代新西兰文学各个领域涌现出不少重要的评论文集、回忆录、自传及史料等,西蒙·加特勒选择了他个人认为最重要且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了介绍^[13]。

面对新西兰戏剧在20世纪70年代的迅猛发展,霍华德·麦克诺顿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因为“许多剧院寻求同一类型的剧本,造成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把舞台上的成功与艺术上的成就联系在一起”^[14]。针对1965年出版的《新西兰新诗》(查尔斯·多伊尔编)和1973年问世的《新西兰青年诗人》(亚瑟·贝斯丁编),彼得·阿尔柯克论述了新西兰诗歌的变迁。阿尔柯克认为,“多伊尔的书显示了五十年代带有灰暗色彩的一代诗人的消亡”,而“贝斯丁一书则完全适应了新一代、新诗才和新风格的需求”^[15]。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一些作品在新西兰问世不久,国内就迅速推出了这些作品的译文,这些新西兰文学作品在新西兰和中国几乎同步出版。新西兰当代文学的及时翻译使国内读者接触到了最新资讯,译介新西兰学者撰写的论文又使国内读者能从宏观上把握新西兰当代小说、诗歌、戏剧的发展态势。

(五)百年诞辰推动下的曼斯菲尔德译评

1988年适逢曼斯菲尔德诞辰一百周年,世界各

⑦任荣珍《新西兰当代毛利作家简况》,《外国文学动态》1985年第3期。

⑧刊登5篇小说分别是詹·卡里奇(James Courage, 1903—1963)《地震之后》,莫·达根(Maurice Duggon, 1922—1975)《爱花情》,奥·爱·米德尔顿(Osman Edward Middleton, 1925—)《独来独往者》,莫·谢德博尔特(Maurice Shadbolt, 1932—2004)《房间》和威·伊希玛埃拉(Witi Ihimaera, 1944—)《曲棍球》。

⑨《新西兰小说五篇》,《外国文艺》1986年第3期。

地纷纷举行纪念曼斯菲尔德的活动。借纪念活动的东风,有关曼斯菲尔德的译评成为这一时期新西兰文学研究的最大亮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版有关新西兰文学方面的8部译著中,曼斯菲尔德小说翻译就有3部。

根据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写作时期和文体风格,1982年《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集》选择了20个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1983年的《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是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之一。它遵循“要篇篇都选得十分确当,又要照顾到女作家的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原则,共选收曼斯菲尔德30个短篇,虽然未免有遗珠之憾,但译者认为“希望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名篇,大多数都已经选进去了”^[1]。到了1988年,外国文学出版社翻译的《蜜月》收录了曼斯菲尔德65个短篇,而且译文中“除了《小妞儿》《稚气却很自然》《起风了》《夜阑》和《一杯茶》外,其余60篇在我国都是首次译出”^[16]。在短短的几年里,3部小说集当中收录的译文数量呈现出急剧增长的趋势。

在该时期发表的32篇学术论文中,论述曼斯菲尔德的占了多半,共有21篇。其中12篇论述曼斯菲尔德的具体作品,6篇探讨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艺术,2篇把曼斯菲尔德与其他人物进行比较,1篇简介曼斯菲尔德生平。论述曼斯菲尔德具体作品的论文涉及《园会》《幸福》《启示》《女掌柜》《康乃馨》《使女的一生》《白丽尔小姐》《没有脾气的男人》《年轻家庭女教师》和《一个已婚男子的自述》10个短篇。从具体文本入手剖析曼斯菲尔德小说创作特色是这一时期国内新西兰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特点。钟林认为《园会》的“写作手法颇值得我们借鉴”,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多层次的对比手法,包括场景的对比、人物的对比和细节的对比”^[3]。读完《使女的一生》后,董璐蓓不禁惊叹作者的高超技巧:“仅用这么短的篇幅,这么朴实无华的细节的描写,却展示了一个自私的、非正义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反常关系。”^[2]萧乾不仅翻译而且撰文评述曼斯菲尔德,认为“于平淡中见新奇是曼斯菲尔德作品的一大特色。她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生动的细节描写,塑造了令人难忘的人物画廊,通过不同层次的心态描绘,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17]。对文洁若翻译的《一个已婚男子的自述》,萧乾的评价是:“本篇是她中期的杰作之一,早期的幽默和讽刺逐渐减少,感伤和压抑的情绪占了上风”^[17]。

宗璞撰文论述曼斯菲尔德的节制功夫,认为曼氏的节制在小说创作中表现为内容的取舍熔裁、结尾的处理、细节的选择和文字运用四方面^[18]。陈家宁先后撰文2篇解读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艺术,“曼斯菲尔德的创作着眼于小而不着眼于大,立足于普通而不立足于神奇,她的那些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作品能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受”^[19]。陈家宁还赞叹曼氏的小说是“摄影艺术品”,“曼斯菲尔德善于从生活中摄取富有本质意义和艺术色彩的镜头,并赋予它和谐透明的光耀”^[20]。在情节追求上,陈家宁

以为当属曼斯菲尔德作品最为突出,“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并不一概排除情节,但是她成功地写出了没有情节的小说”^[20]。卢坤缙也对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曼斯菲尔德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她“一反过去小说家的公式化手法,不受结构的局限,不去故意制造一些戏剧化的人物或情节,而把‘镜头’对准一些看来平凡不足道的人物和事物,用从侧面观察的方法叙述情节,让人物心理自然流露”^[21]。郑怡运用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的手法,从创作方法、题材选择和主题处理切入,对曼斯菲尔德与安·波特的短篇小说作了比较。郑怡认为,“实际上,曼斯菲尔德与波特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整体,是经过苦心经营,巧妙地把素材、主题、结构和风格融为一体的完整的艺术品,浅显的表层结构下蕴藏着深刻的内涵”^[22]。

四、结语

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这个接受群体特定的现实变革和历史文化语境的推动和制约。从绝对数量上看,1976至1989年间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不多,但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文革之前,外国文学研究本身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上的西方文学现象,着重分析它们是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时代的,是人民的文学还是统治阶级的文学”^[23]^[42]。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无论是曼斯菲尔德还是诗人雷纳德·梅逊,传入中国之后都成了政治哈哈镜中的扭曲镜像,1976至1989年间的新西兰文学研究则逐步摆脱了阶级分析的弊端,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新西兰文学研究之门。20世纪90年代的新西兰文学译评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既有成果并开拓创新,在平稳中大踏步前进,其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升,研究视域也进一步扩展。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新西兰文学研究更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从纵向发展来看,1976至1989年间的新西兰译评研究构成了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史上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 [1]方平.笔端蕴秀,如见其人——谈曼斯菲尔德的写作艺术[M]//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陈良廷,郑启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 [2]董璐蓓.《使女的一生》及其作者——凯瑟琳·曼斯菲尔德[J].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72-77.
- [3]钟林.卡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她的《游园会》[J].国外文学,1983(3):213-218.
- [4]虞建华.从“英国绅士”到“新西兰人”——谈新西兰民族文学的成因[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2):54-60.
- [5]任荣珍.毛利战争·拓居·淘金——简介1860—1890年的新西兰小说[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03-107.
- [6]任荣珍.毛利口头文学[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

- 社会科学版,1987(4):113-120.
- [7]任荣珍.新西兰毛利口头文学[J].外国文学研究,1988(4):70-76.
- [8]虞建华.新西兰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 [9]马祖毅.大洋洲诗话[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4):80-88.
- [10]马祖毅.大洋洲诗话(续)[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86-93.
- [11]彼得·辛普森.送往迎来:八十年代的新西兰小说[M]//古老的植物湾.合肥: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1984.
- [12]彼得·辛普森.河深水广:八十年代新西兰的诗歌[M]//古老的植物湾.合肥: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1984.
- [13]西蒙·加特勒.从拓荒者到诗学:八十年代新西兰文史粗谈[M]//古老的植物湾.合肥: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1984.
- [14]霍华德·麦克诺顿.当代新西兰戏剧——专业剧作家的崛起[M]//自由树上的蝙蝠.合肥: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1981.
- [15]彼得·阿尔柯克.新西兰诗歌的变迁:附评一位诗人[M]//安着木腿的人.合肥: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1982.
- [16]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蜜月[M].文洁若,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
- [17]萧乾.曼斯菲尔德和她的《一个已婚男子的自述》[J].外国文学,1988(5):13.
- [18]宗璞.说节制——介绍《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J].读书,1984(10):28-32.
- [19]陈家宁.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45-50.
- [20]陈家宁.曼斯菲尔德散文式小说一二谈[J].外国文学,1988(5):67-70.
- [21]卢坤缙.浅谈英国文学史上短篇小说的发展及女作家曼斯菲尔德[J].外交评论,1988(2):76-78.
- [22]郑怡.浅显中的深奥——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与凯瑟琳·安·波特短篇小说比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83-90.
- [23]龚翰熊.西方文学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New Zealand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from 1976 to 1989

LIU Luech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P. R. China)

Abstract: From 1976 to 1989 the studies of New Zealand literature in China came into being. This period held a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 Zealand literature in China. On one hand, China was on a transition st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domestic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began to get into the right track. The blending of discipline budding and historical transition left a deep mark on the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New Zealand literature. On the whole, the research of New Zealand literature represent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paradigm shifted from the class-centered to the aesthetic-centered analysis; scholars surveyed New Zealand literature for the purpose of popularization; the studies of Maori literature began to emerge; investigators kept a close eye on the trends of contemporary New Zealand literature;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Katherine Mansfield promoted the relevant translation and criticism. The number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was not very large, but the translation and criticism of New Zealand literature from 1976 to 1989 became a crucial stage in the studies of New Zealand literature in China.

Key words: New Zealand literature; literary studies; China; dissemination

(责任编辑 周沫)